

从《元史》的编撰看冯子振的籍贯

蔡堂根

(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,杭州 310018)

摘 要:冯子振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,其籍贯最早见于《元史》,但明清以来一直存在争议,有人因此怀疑《元史》记载的准确性。从《元史》的编撰情况看,《冯子振传》可能出于宋濂之手,其位置编排亦经过仔细考虑,出错的可能性极小。明初的《半轩集》和攸县当地家谱中的相关记载也可以佐证《元史》之说。因此,《元史》关于冯子振籍贯的记载是准确的,冯子振籍贯的“攸县说”可信。

关键词:元史;冯子振;籍贯;攸县

中图分类号:K820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3851(2016)04-0382-07 **引用页码:**080401

冯子振(1257—约1348),字海粟,号怪怪道人,又号瀛洲客等,有《海粟集》传世,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,曾与大书法家赵孟頫等交游。但其籍贯众说纷纭,争议颇大。据统计,共有攸县说、湘乡说、宁乡说、东海说、双峰说、长沙说等多种观点^[1],除“东海”在今江苏省外,其他几处均在湖南省境内。其中,攸县说和湘乡说影响最大,其他几种均属偶有记载,且多为明显的误记或理解上的差异,影响较小。目前,学术界多围绕攸县说和湘乡说展开讨论,且涉及《元史》记载的准确性问题,因此,本文拟从《元史》的编撰入手,探讨冯子振籍贯“攸县说”的可信性。

一、针对“攸县说”及《元史》记载的质疑

“攸县说”最早见于《元史》,这也是最早明确记载冯子振籍贯的权威文献,《元史·陈孚传》后附《冯子振传》,载云:“攸州冯子振,其豪俊与孚略同。”^{[2]4340}后来的志书和相关著述多持此说,如《明一统志》《嘉靖长沙府志》《乾隆攸县志》及明人邵经邦《宏简录》、清人陈焯《宋元诗会》等皆持此说。“湘乡说”最早见于明景泰年间的《寰宇通志》,其后《嘉靖湖广通志》《康熙湘乡县志》《乾隆长沙府志》等方志亦持此说。在当前学术界,“攸县说”和“湘乡说”仍相持不下,马积高《〈海粟集辑存〉序》、王毅《冯

子振年谱》、桂栖鹏《冯子振生平三考》、张昌红《冯子振籍贯考——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》等持“湘乡说”,刘洪仁《冯子振生平初探》、易小斌《冯子振籍贯与生平新证》、刘一闻《〈虹月楼记〉卷和冯子振翰墨》等持“攸县说”。总体而言,古代文献中“攸县说”是主流,当前学术界则“湘乡说”占上风。

质疑“攸县说”的主要依据是:湘乡有《山田冯氏续修族谱》(修于光绪年间,始修于康熙年间),该谱对冯子振的生平世系等有明确的记载,湘乡县志也有较详细的记载。而攸县找不到记载冯子振世系的冯氏族谱,县志的记载也不如湘乡具体、详尽,故受到质疑。马积高《〈海粟集辑存〉序》称:“攸县县志虽也载有海粟传,认为是攸县人,然并不能确指其居于攸县何地,其中说到曾发现所谓海粟墓碑,语尤模棱,既说字迹模糊,又谓可以辨识,可见是弄虚作假。而湘乡县志和家谱则不仅明记其乡里,又明载其墓地所在。”^{[3]2}同时,必然会对《元史》的记载表示怀疑,如马积高《〈海粟集辑存〉序》提及王夫之的相关记载后称:“尽管作《元史》的宋濂等距离海粟生活的年代近,船山及其友人距离海粟的时间远,但我们却宁相信湖南人的船山,而不相信浙江人的宋濂。”^{[3]3}

其实,《元史》作为最早记载冯子振籍贯的官方

文献,不管是支持“攸县说”还是质疑“攸县说”,都必须认真面对。支持“攸县说”必然认可《元史》的记载,质疑“攸县说”必然怀疑《元史》的记载;如果《元史》的记载无可怀疑,也就不会质疑“攸县说”。因此,我们可以从《元史》的编撰入手,看看《元史》记载的可信度。

对《元史》的质疑,张昌红的《冯子振籍贯考——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》最具代表性,不妨详细引述其观点,以见一斑:

一味偏信宋濂所修《元史》的做法也是不恰当的。……《元史》开馆于明洪武二年二月,由从各地征起的“山林遗逸之士”非仕元者十六人具体负责纂修工作,当年七月即告成书。《元史》编纂如此仓促,并且纂修之人非堪史才,所以谬误很多,成书不久即遭人垢病。顾炎武曾指出《元史》“本纪有脱漏月者”,列传有“一人两传”及“重书年者”。……宋濂生活时代虽距冯氏为近,但修《元史》他只是挂名,并未亲自撰写,加之《冯子振传》又附于《陈孚传》之后,位置甚微,修史者仓促之间因资料取舍不当或其它原因,导致误载其籍贯是完全有可能的。^[1]

这里对《元史》的评述是否确切,笔者暂不评论,我们还是先看看《元史》的编撰情况,以便对冯子振的相关记载有更清晰的认识。

二、《元史》编撰的相关情况及其缺陷

洪武元年(1368年),明兵攻克大都,获得元十三朝《实录》。洪武二年二月即第一次开史局编修《元史》,八月结束。因元朝刚刚灭亡,许多材料很不完整,《元史》编修亦未完善,如末代皇帝元惠宗30多年的历史因缺乏可信的文献而无法编写。后经专门采集,于洪武三年二月再次开局编修、补充,当年七月全部完成。第一次编修时,宋濂、王祚任总裁,参与者有汪克宽、胡翰、宋禧、陶凯、陈基、赵壘、曾鲁、赵汭、张文海、徐尊生、黄箴、傅恕、王錡、傅著、谢徽、高启,共16人。第二次编修时,仍以宋濂、王祚为总裁,参与者有赵壘、朱右、贝琼、朱世濂、王廉、王彝、张孟兼、高逊志、李懋、李汶、张宣、张简、杜寅、俞寅、殷弼,共15人。赵壘前后两次均参与其事,因此,除两位总裁外,真正参与《元史》编修的共30人^[4]。关于这30个修史人员的情况,学术界有较充分的研究。

首先,从身份看,他们都是身无官职的“山林遗逸之士”。宋濂曾说:“乃洪武元年十有一月,命启十三朝《实录》,建局删修,而诏宋濂、王祚总裁其事。

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,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删之公也。”^[5]赵汭亦说:“乃诏修《元史》,起山林遗逸之士使执笔焉,凡文儒之在官者无与。于是,在廷之臣各举所知以应诏。”^[6]也就是说,这些修史人员既未曾在元朝担任行政职务,也不在明朝政府中任职。据说这一选择标准是朱元璋亲自制定的,以便对元朝历史进行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其次,从籍贯看,他们多是江浙人。“从已知26人的籍贯来看,其中浙东9人(胡翰、陶凯、陈基、张文海、王廉、傅恕、朱右、朱世濂、张孟兼),浙西11人(宋禧、徐尊生、傅著、谢徽、高启、贝琼、王彝、张宣、张简、杜寅、殷弼),江东3人(汪克宽、赵汭、李汶),江西2人(赵壘、曾鲁)。以上都是长江以南人。两位总裁都是浙东人。唯一例外是高逊志,他是萧县(今安徽萧县)人。……但他长期在嘉兴、‘吴门’(平江,即苏州)寓居,在那里读书,实际上也可归入浙西之列。这就是说,《元史》的编纂班子实际上是由江南、特别是两浙(浙东西)的文人儒生组成的。”^[4]这种情况的出现,一方面是明朝初期建都南京,江浙是其政治文化中心。另一方面,当时江浙地区的文化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,有一大批知名的文人儒生。而且,主修《元史》的宋濂、王祚两人都是浙东人,他们和江浙文人儒生有广泛的交游,他们所组织的编修人员自然会以江浙人为主。

再次,从学识看,他们都是极具才华的文人。总裁宋濂和王祚的诗文、经术成就自不必说,其他30人在诗文、经术领域也都有一定的声望。“编纂班子中的大多数(或者说绝大多数)都是当时享有一定声望的文人儒生,有的擅长辞章,有的则以经术著称。不少人著作等身,胡翰、陈基、张孟兼、朱右、宋禧、高启、贝琼、王彝、张宣、汪克宽、赵汭等人,都有诗文集流传至今。其中如汪克宽、赵汭的经学,张孟兼的辞章,高启的诗文,曾鲁的博学,在元明之际是有盛名的。”^[4]这一判断在明清时期就得到相关学者的认可,如朱彝尊称:“明修《元史》,先后三十史官,类皆宿儒才彦。”^[7]

这一豪华的编修团队按理说应该编出一部较好的史书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元王朝刚刚灭亡,许多史料来不及收集整理;朱元璋设置的许多条条框框,束缚了修史人员的手脚;这些“山林遗逸之士”未在元王朝当过官,对元朝的政治、经济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;这些江南人不懂蒙古语,许多蒙古人的典章制度得不到正确的解释,等等。由于这诸多的原因,《元史》确实存在许多缺陷,如有的人该立传而没有立

传,有的人一个人立了两个传,有的蒙古语译名前后不一致,有的人物、事件考订不仔细等。后人因此对《元史》有较多的批评,尤以钱大昕的批评最极端,他说:“修《元史》者,皆草泽腐儒,不谙掌故。一旦征入书局,涉猎前史,茫无头绪,随手寻扯,无不差谬……综前后仅三百三十一日。古今史成之速,未有如《元史》者,而文之陋劣,亦无如《元史》者。”^{[8]232}

三、《冯子振传》的特殊性与可信性

由于《元史》存在许多缺陷,人们对《元史·冯子振传》准确性的质疑看似有道理,其实不然。《冯子振传》是一篇特殊的小传,其特殊性决定《元史·冯子振传》完全可信。《冯子振传》附在《陈孚传》之后,全文如下:

攸州冯子振,其豪俊与孚略同。孚极敬畏之,自以为不可及。子振于天下之书无所不记。当其为文也,酒酣耳热,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。子振据案疾书,随纸数多寡,顷刻辄尽。虽事料浓郁,美如簇锦,律之法度未免乖刺。人亦以此少之。^{[2]4340}

这篇人物小传仅仅涉及冯子振的籍贯、性格、文章特点等基本内容,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性:

其一,《元史》整体上的重大问题很难在该传中出现。这里不需要对蒙古语的了解,不需要对政治经济、典章制度的阐释,也与整个元王朝的史料无关,与朱元璋的各种限制无关。编修史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去撰写,也完全有能力撰写好这种人物小传。在这种人物小传中,很难出现明显的问题。

其二,修《元史》者多是江浙人,都是“山林遗逸之士”,且时间太近,元王朝结束的第二年就开局修史,很多材料来不及收集整理,很多问题来不及沉淀梳理,这些因素都是造成《元史》缺陷的重要原因。但是,就《冯子振传》的撰写来说,这些因素都是有利的,它们确保了《冯子振传》的准确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:第一,冯子振自皇庆元年(1312)南下寓居苏州,直到至正八年(1348)前后去世,极大多数时间都活动于江浙地区。以江浙人为主体的修史团队自然对冯子振有较多的了解,能够把《冯子振传》写得更准确。第二,冯子振生活于江浙时已经罢官,他所交往的多是佛道、隐逸、文人画士等人物,这些人物与《元史》修撰者的“山林遗逸之士”是一致的。换言之,修《元史》的“山林遗逸之士”本来就与冯子振“臭味相投”,相对其他群体来说,他们对冯子振

的了解最多。第三,洪武二年(1369)开始修《元史》,如果冯子振确实去世于至正八年(1348),中间仅相差21年,部分《元史》修撰者可能见过冯子振,甚至与冯子振有过交往。这些人对冯子振很了解,由他们出手写个短短的《冯子振传》,应该不会出现明显的错误。

其三,《冯子振传》仅百来字,且附在《陈孚传》之后,很不显眼,因此有人认为,这会造成“修史者仓促之间因资料取舍不当或其它原因,导致误载其籍贯”^[1]的现象。这其实是想当然之说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:第一,冯子振以百来字的小传进入官修的《元史》,不是委屈了冯子振,而是拔高了冯子振。《元史》列传分为后妃、宗室、诸臣(有较大影响的大臣)、儒学、良吏、忠义、孝友、隐逸、烈女、释老、方技、宦者、奸臣(包括奸臣、叛臣、逆臣)、外夷十四大类,冯子振可能进入的有诸臣、儒学、良吏、忠义、孝友、隐逸、释老等七类。冯子振只任过集贤待制的闲职,且无任何突出的政绩,想进入“诸臣”或“良吏”是不可能的;冯子振晚年与佛道人物有联系,有点像隐逸者,但既不属“释老”,也不是“隐逸”,这两类也进不了;在“忠义”、“孝友”方面也没有突出的表现,因此,冯子振只能归入“儒学”。《元史》的《儒学》虽说包括一般正史中的“儒林”、“文苑”两类,但实质上几乎都是“儒林”人物,传主或者在学习、研究儒学中有成就,或者在传授儒学方面有贡献。在《元史·儒学》的各传中既未署官职,又与儒学毫无关联的,似乎只有冯子振一人。但冯子振在诗文词曲等方面的成就并不是十分突出,在艺术水平上,其诗文等“律之法度未免乖刺”^{[2]4340};在文学成就上,逊色于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王实甫等名家。关汉卿等人均未能在《元史》中立传,冯子振能够立传,显然是《元史》编撰人员的偏爱。冯子振既为《元史》编撰者偏爱,是有意安排的,其小传就决不会随意处理,以致“取舍不当”。第二,《冯子振传》附在《陈孚传》之后,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。《元史·儒学》人物传的安排是有规律的,在《儒学》卷(包括一八九、一九〇两卷)中,凡是本人之传很短,要附在他传之后的,附传和主传之间一般都存在关联,包括父子兄弟、师友同乡等关系。如《胡长孺传》之后附胡之纲和胡之纯的合传,开篇即云:“其从兄之纲、之纯,皆以经术文学名。”^{[2]4334}《刘诜传》之后附龙仁夫和刘岳申的合传,开篇即云:“同郡龙仁夫,字观复。刘岳申,字高仲。其文学皆与诜齐名,有集行世。”^{[2]4342}冯子振与其他

的主传者之间不存在这种“师友同乡”等关系，只好以“其豪俊与孚略同”而附在《陈孚传》后；这种以性格相似而附在一起，在《元史·儒学》卷中也是绝无仅有的，可以说是煞费苦心。而且，《冯子振传》附在《陈孚传》之后，很可能与他们早年的冲突有关，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载：“中书省臣言：‘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誉桑哥，且涉大言，及桑哥败，即告词臣撰碑引谕失当。国史院编修官陈孚发其奸状，乞免所坐，遣还家。’帝曰：‘词臣何罪！使以誉桑哥为罪，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！朕亦尝誉之矣。’”^{[2]362}也许因为存在这样的过节，《元史》编修者才把二人联系在一起。显然，《冯子振传》附在《陈孚传》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《元史》编修者既已破例在《元史》中为冯子振立传，又深思熟虑地把它附在《陈孚传》之后，小传开篇的“攸州”两字如果是误记，不可能不引起注意。

其四，《冯子振传》的形成，可能与宋濂有关。宋濂作为编修《元史》的总裁，既负责过全书体例的设计，也对《元史》人物的取舍有决定权，如《元史》中的《戴表元传》就是宋濂指令相关人员访求搜集而编入《儒学》中的^[4]。另有一些人物传记的初稿则直接出自宋濂之手，如《胡长孺传》、《郑文嗣传》、《余阙传》等^[9]。

《冯子振传》的撰写同样与宋濂有关系。宋濂生于1310年，至冯子振1348年去世时，已近四十岁，很可能见过冯子振。宋濂有《题冯子振〈居庸赋〉后》一文，云：

海粟冯公以博学英词名于时。当其酒酣气豪，横厉奋发，一挥万余言，少亦不下数千，真一世之雄哉！遗墨之出，争以重货购之，或刻之乐石，或藏诸名山，往往有之，则为人之宝爱可知矣。余藏此卷者久，极为珍秘，今以归蒲圻魏先生。先生博雅君子，必有以赏识之。斯文为有所托矣。友生金华宋濂跋。^[10]

此文表明，宋濂曾长时间拥有《居庸赋》，并极其珍爱，这无疑会提高冯子振在宋濂心中的地位，因此可能破格把冯子振纳入《元史》。另外，《题冯子振〈居庸赋〉后》与《冯子振传》对冯子振的描述基本一致，只不过因表达的需要，一个简约概括，一个具体细致：如“博学”与“天下书无所不记”；“英词”与“事料浓郁，美如簇锦”；“酒酣气豪”与“豪骏”、“酒酣耳热”；“一挥万余言”与“据案疾书，随纸数多寡，顷刻辄尽”；“为人之宝爱可知”与“人亦以此少之”等，尽管在文字表述上有变化，但在内容上完全一致。换

而言之，《冯子振传》很可能是根据宋濂的《题冯子振〈居庸赋〉后》完成的，甚至是由宋濂亲自撰写的。如果这种推测成立，冯子振的籍贯更不可能出错。

最后，即使“攸州”二字出错了，这个错误也不可能是由“湘乡”两字错过来的。造成地名错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，即地理位置紧邻，难以区分界限；读音相同，在口耳相传过程中易造成混淆；字形相同，在传抄过程中易造成混淆。但攸州与湘乡相距很远，不存在地理上的区分困难；它们的字形和语音相差很大，把“湘乡”错念成“攸州”或错写成“攸州”都难以想象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元史》编修者不可能因笔误或口误等原因，把“湘乡”写成“攸州”。

总之，《元史》中的《冯子振传》是经过编修人员认真审核而留下的，不存在疏忽大意、草率了事之说，“攸州”二字不可能是“湘乡”二字的误载。“攸州冯子振”的记载完全可信。

四、“攸县说”的其他佐证材料

尽管《元史》中的“攸州冯子振”是可信的，但如果找不到其他可印证的材料，这从学理上看，仍然难免孤证之嫌。因此，我们也按常规，另外列出几条可资佐证的资料。

其一，元末明初的王行《半轩集》之《沈荣甫墓志铭》中有“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”之语。沈荣（1306—1376），苏州长洲人，其父沈富，即沈万三。王行，字止仲，号半轩，与沈荣同乡。王行在元末即有文名，曾在沈家担任沈氏子弟的教师。入明后，曾在凉国公蓝玉家坐馆授徒，因蓝玉的推荐而得到朱元璋的召见，后在“蓝玉案”中被杀。王行的《沈荣甫墓志铭》全文如下：

荣甫姓沈氏，讳荣，世为苏之长洲人。考富，妣曾。生于元大德十年春正月闰之甲申，卒于国朝洪武九年秋八月之壬寅。得年七十有一，娶叶氏，先卒。丈夫子二：长森，次彬。森先七月卒。女子四：德淑适何，德美适张，德仪适周，德谊适钱，皆同郡也。孙男三：经、綖、绅。女二：徽、微。以九月甲子葬尹山乡长山之原。呜呼，荣父考诸其乡，盖所谓善人者矣。初，荣父之先君子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之门，公每嘉其敦信义。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，号海粟，以文翰自矜许，来吴必主之。深加爱厚，为大书“积善”二字，殆以表其志也。及荣父持家政，乃筑堂构宇，以冯书揭诸题间。既以承大先志，又以最其后人。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。故得

优游暮年,克享耆寿。夷然委顺,全之以归,亦可以无憾矣。宜铭曰:好善人之所同,为善吉之所鍾。吁嗟而翁,繫善之从。天年既崇全厥终,铭辞永古昭幽宫。^[11]

后世的很多文献提及冯子振籍贯时,往往援引《元史》之说,因此无法作为《元史》“攸州冯子振”的旁证。本铭完成于洪武九年,距离《元史》成书的时间很近,考虑到当时雕版、印刷、发行的周期,作者撰写此铭时应该未受《元史》的影响。也就是说,“长沙攸县人冯子振”应该是另有来源。另外,冯子振既然经常来沈家,沈富及其家人对冯子振的籍贯应该很清楚。沈荣生于1306年,冯子振去世时他已经40多岁,沈荣无疑见过冯子振,他的年长的子女也应该见过冯子振。而且,冯子振题的“积善”二字被沈家作为“以承大先志,又以最其后人”的匾额,受到特别的尊重,沈荣的子女儿孙即使没有见过冯子振,也应该清楚冯子振的籍贯。在这种情况下,王行如果受《元史》影响而把冯子振的籍贯错写成“长沙攸县人”,必然会受到沈荣儿孙等家人的质疑。这表明,曾与冯子振有密切交往的沈富及其家人都认为冯子振是攸县人,与《元史》的“攸州冯子振”之说一致。

其二,《攸县东门陈氏九修族谱》中收录了两篇署名冯子振的文章,即《宋攸令始祖旻泰公二世祖文轩公合沟记》和《爱云逸叟记》。该谱修于民国年间,谱前有李东阳、杨一清等人的序,故其始修当在明弘治年间或更早。

《爱云逸叟记》的主人公即陈允恭,字彦敬,别号爱云逸叟,与冯子振同时代,是攸县东门陈氏的第四世子嗣。陈氏族谱中有贺守贞撰写的《陈允恭传》,称其:“体貌魁梧,寡言笑酬酢,时与冯子振、周自强、刘畊孙辈相赓唱。”^①陈允恭未曾为官,一直在攸县县城东皋一带过着隐居式的生活。东皋与攸县上云桥乡冯家坳村邻近,据说冯子振的老家就在冯家坳。冯子振居攸县冯家坳之说尚待考证,但《攸县东门陈氏九修族谱》中两篇署名冯子振的文章是确凿的。该谱的始修时间很早,主人公陈允恭与冯子振的时间也相当,可信度很大。这表明,冯子振确曾在攸县生活过。

其三,攸县钟佳桥平分田《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》(卷五)提及冯子振,该谱《湖溪总系》在欧阳仕龙的小传中称:“欧阳仕龙,字应运,生元延祐庚申(1320)。好学深谋,勇略拔萃,推授百宰,倾义兵守醴陵白关铺,保障一邑,民恋不忘。明洪武丙子(1396)卒,葬潭头,壬丙向。配冯,系银坑冯朝卿第

四女,乃元集贤院待制冯子振字海粟之孙女,生元泰定丙寅(1326)九月十三寅时,明永乐己丑(1409)七月初十子时卒,葬方木冲菱角塘,巽乾向。生子时安。”^②作为欧阳仕龙在族谱中的小传,其配偶的情况似无作假的必要;《湖溪欧阳氏族谱》始修于明永乐二十二年(1424),与“冯氏”卒年仅相距15年,关于“冯氏”的记载应该不会出错。因此,欧阳仕龙之妻冯氏、岳父冯朝卿和“集贤院待制冯子振字海粟之孙女”等内容应该可信。《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》的载述表明,冯子振确是攸县人。

五、攸县地方文献缺失的原因

攸县地方文献对冯子振的记载确实很有限,清代以来,攸县的部分文化人士都不知道当地曾经有个冯子振。蔡而伟(1597—1667)曾写过冯子振《梅花百咏》的和诗,并留有《次冯子振海粟先生梅花百咏小序》,在蔡氏族谱上,该序的后面附有蔡上桂(1674—1754)的按语,说:“余观斯题,始知冯先生出自攸邑,为元时大学士。惜其诗与文见重于当时,未传于后世。即余涉世多年,访问乡城庠友,无有知者,竟成湮没。兹补刻房祖雪航先生(即蔡而伟,笔者注)《梅花诗序》于谱,俾后生披阅,固不忘雪航祖之诗,亦不泯冯学士之学也。”^③攸县地方文献对冯子振的失载可见一斑。这种地方文献的缺失,成了质疑“攸县说”的重要依据。

这一现象的形成,应该与冯子振晚年的经历有关。冯子振自皇庆元年(1312)罢官南下到其去世,其间虽曾北上大都,有过短时间的逗留,但极大多数时间还是以苏州、扬州为中心,活动于江浙地区。其有确切时间可考的最晚的两篇序记,即七十三岁(天历二年)时的《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记》和八十一岁(至元三年,1377)之后的《〈本草元命苞〉序》,均写于江浙地区。

冯子振晚年的作品多提及其寓居扬州,如六十九岁(泰定二年)的《题赵承旨白鼻騮图》末署“书于维扬寓室”^{[12]6},七十三岁(天历二年)时的《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记》中有“广陵之城隍西庑旧构祠,严事云长甚谨”^{[12]76}之语,张伯雨有《寄冯海粟待制附天目僧过广陵》等诗,说明冯子振一直客居扬州。冯子振约于

① 见:《攸县东门陈氏九修族谱》卷一,民国刊本。

② 见:攸县《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》卷五,民国刊本。

③ 见:攸县《涿田蔡氏九修族谱》卷一,2001年刊本。

至正八年(1348)去世,其去世的地点也应该在扬州。这可以从朱德润《挽冯侍御》中找到一些线索。朱德润与冯子振关系密切,冯子振初到江南就在苏州见过朱德润,并为他作过《赠朱泽民序》,后来冯子振去大都,朱德润作过两首《送冯海粟待制入京》,故朱德润的《挽冯侍御》完全可信。为分析方便,全诗抄录如下:

登高原而怅望兮,陨乔木于江城。谓耆德之方茂兮,将续年而百龄。奚巫阳之下招兮?返帝阍之高明。哀吾邦之群彦兮,俾何从乎老成?昔公周流四方兮,涉世路之险平。乐林泉而栖迟兮,友渔樵而忘形。望笋舆之不再兮,揭丹旌于邮亭。故乡遥兮亲戚惊,九原遽兮閤泉扃。惨物交兮鸟悲鸣,嗟孝子兮心茕茕。^{[12]97}

“故乡遥兮亲戚惊”,说明冯子振是客死他乡;“嗟孝子兮心茕茕”,孝子“心茕茕”,没有其他亲友的帮助,同样说明冯子振客死他乡。冯子振客死于何地呢?朱德润写《挽冯侍御》,应该在冯子振身边或离冯子振不远;朱德润生活于苏州,冯子振应当去世于苏州或其周边地区。另外,“哀吾邦之群彦兮,俾何从乎老成”,说明冯子振去世前一直是“吾邦之群彦”依从信赖的“老成”者,冯子振去世前一直与“群彦”在一起;“吾邦”显然指朱德润所在的苏州及其周边地区,这同样说明冯子振客死于苏州或其周边地区。冯子振的相关作品表明,他晚年曾长时间寓居扬州;“陨乔木于江城”说明他去世的地点是一个沿江的“江城”,与扬州吻合,且扬州离苏州不远。由此推断,冯子振当客死扬州。

冯子振的遗体后来是否运回攸县,已不得而知。从“故乡遥兮亲戚惊”,“嗟孝子兮心茕茕”等语看,冯子振的遗体很可能没有运回攸县。冯子振去世之时,正是元末开始动荡的时期,在这种时局下,要把遗体从遥远的扬州运回攸县,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难以想象的。据《湖溪欧阳氏七修族谱》记载,冯子振儿子冯朝卿后来移居银坑,说明冯子振儿子辈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富裕,要长距离运回冯子振的遗体,恐怕很困难。既然冯子振的遗体没有运回攸县安葬,再加上他晚年一直寓居苏州、扬州等地,攸县当地自然不会留下多少遗迹。

六、结 语

冯子振籍贯的“湘乡说”在明朝景德年间就见诸《寰宇通志》,后来的《嘉靖湖广通志》《康熙湘乡县志》

《山田冯氏续修族谱》等文献均有相关的记载。这些记载表明,冯子振与湘乡应该存在某种联系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,尚有待于全面深入的考察。但是,为了坐实“湘乡说”而简单地否定《元史》的记载,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。

《元史》在编撰过程中,确实存在编撰时间仓促,史料收集不全;编撰人员都是江南的“山林遗逸之士”,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掌握不全面,对蒙古人的典章制度理解不透彻等问题,影响了《元史》的总体水平。但是,这些“问题”对于《冯子振传》的撰写来说,却是难得的有利条件,能够保证《冯子振传》记载的准确。《冯子振传》很短,该传收入《元史·儒学》,并附于《陈孚传》之后,都是由编撰人员精心安排的,出错的可能性极小;而且,同时代的《半轩集》可以为之佐证,攸县当地的家谱也有相关的记载。因此可以断言,《元史》关于冯子振籍贯的记载是准确的,冯子振籍贯的“攸县说”可信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张昌红. 冯子振籍贯考: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[J]. 中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3, 19(1): 234-238.
- [2] 宋濂, 王祎, 陶凯, 等. 元史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6.
- [3] 马积高. 《海粟集辑存》序[M]//冯子振. 海粟集辑存. 王毅, 编注. 长沙: 岳麓书社出版社, 1990.
- [4] 陈高华. 《元史》纂修考[J]. 历史研究, 1990(4): 115-129.
- [5] 宋濂. 文宪集: 卷五·吕氏采史目录序[M]//四库全书. 文渊阁.
- [6] 赵汭. 东山存稿: 卷二·送操公琬先生归番阳序[M]//四库全书. 文渊阁.
- [7] 朱彝尊. 曝书亭集: 卷三五·元史类编序[M]//四库全书. 文渊阁.
- [8] 钱大昕. 十驾斋养新录附录[M]//孙显军, 陈文和, 点校. 嘉定钱大昕全集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7.
- [9] 朱仲玉. 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[J]. 史学史研究, 1983(4): 41-48.
- [10] 宋濂. 文宪集: 卷十三·题冯子振《居庸赋》后[M]//四库全书. 文渊阁.
- [11] 王行. 半轩集: 卷九[M]//四库全书. 文渊阁.
- [12] 冯子振. 海粟集辑存[M]. 王毅, 编注. 长沙: 岳麓书社出版社, 1990.

Discussion on Feng Zizhen's Native Place from the *History of Yuan Dynasty*

CAI Tanggen

(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, Zhejiang Sci-Tech University, Hangzhou 310018, China)

Abstract: Feng Zizhen is a famous litterateur in Yuan Dynasty, whose native place can be found in the *History of Yuan Dynasty* at the earliest. But his native place has been always on debate sinc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so that someone doubts the accuracy of the *History of Yuan Dynasty*. From the compiling situation of the *History of Yuan Dynasty*, the *Biography of Feng Zizhen* might be written by Song Lian, and its position arrangement is also considered carefully, which makes it has limited possibility to make a mistake. The Banxuan Corpu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some related records in local genealogy of You County can also support the statement of the *History of Yuan Dynasty*. So, the record of Feng Zizhen's native place in the *History of Yuan Dynasty* is accurate, and the version that Feng Zizhen's native place is You County is credible.

Key words: *History of Yuan Dynasty*; Feng Zizhen; native place; You County

(责任编辑:任中峰)